

# 法国大革命：变迁、结构、话语

## ——以《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中心

胡杨益

**摘要：**要解读托克维尔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必须站在大革命所表现的“时间性”上的“连续性”去理解其改革悖论；而解构托克维尔的改革悖论，则可以运用社会运动研究的基本视角：变迁、结构、话语。社会变迁中的法国社会正处于不稳定的转型期，一旦政府有效性下滑，在社会心理上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则会触发大革命；社会结构上，国家层面的中央集权制，社会层面的社会阶层分裂，以及两者之间又缺乏中间纽带使得社会极易失控爆发革命；在话语层面，则表现为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权力真空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则被缺乏政治经验的文人所乘虚掌握。当下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在面临着各类社会状况和社会风险，法治中国的建设给中国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价值规范，降低了社会失控的风险。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社会运动；法国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简介：**胡杨益，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文化学与社会学教研部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5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6.02.005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生前最后的著作<sup>①</sup>。他在书中阐明其写作目的，“目前出版的这本书，并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那段历史，早已有人写得很精彩，我根本不会考虑重写。本书仅研究那场大革命。”<sup>[1]</sup>对于大革命，托氏着墨的核心在于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探究，“几乎在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只在法国而不在别处爆发，为什么会在即将摧毁的那个社会中自发产生；古老的君主制度，为什么会如此彻底的崩溃。”<sup>[1]</sup>他当然也想以古鉴今，展望未来，只可惜还未来得及撰写续作，便离开了人世。书中引人注目的不仅仅在于托氏对大革命原因的探讨，更能引起人们思考的是他在书中提出的问题：“旨在消灭中世纪残余制度的大革命，并非在封建制度残留最多、人民受其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在压迫最轻的地方爆发。”<sup>[1]</sup>“对于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候。”<sup>[1]</sup>

问题的提出只是大革命这一事件的表征，托克维尔抓住了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在有力回击：“他写的是大革命的另一部历史，这部历史的基点就是对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对他看来构成法国大革命自身虚幻性的东西的批判。”<sup>[2]</sup>托克维尔敏锐地观察到了法国大革命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在时间上亦不是一个短暂的时点，而是一种“连续性”。这是托克维尔在历史观上的高明表现，而要深入理解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则可以借鉴革命和社会运动研究的基本

① 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的时间并不是1789年的断裂点，大革命在时间性上呈现“连续性”。在托氏眼中，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和之后的社会状况都是革命的先行和延续，其社会性质和社会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因此，作者以“法国大革命：变迁、结构、话语”为题，以应托氏之思。

视角:变迁、结构、话语<sup>①</sup>。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源在于其合法性的衰败带来的共同体层面上合法性危机,政府有效性的不足给民众在社会心理上所带来的剥夺感增加则直接触发这场大革命,而更为宏观的是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秩序博弈。社会变迁中的法国社会正处于不稳定的转型期,一旦政府有效性下滑,在社会心理上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则会触发大革命;社会结构上,国家层面中央集权制,社会阶层分裂,而两者之间又缺乏中间纽带使得社会极易失控爆发革命;在话语层面,则表现为政治上的合法性危机,想要摆脱传统社会的法国政府在走向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权力真空下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则被缺乏政治经验的文人所乘虚掌握,文人们的话语更加刺激了革命的爆发。

## 一、大革命在时间性上的“连续性”

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结构安排上,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此书的叙述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界说大革命的历史意蕴及其基本内容,而法国事件的方式相对于其内容和基本规定性来说是次要的,后者才是他的分析对象:国家-公民社会辩证关系在法国是怎样演变的,在旧制度的最后几个世纪和最后几十年里是怎样走过来的,是怎样被思考和被重新想象的,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秘密所在,也是它在年代学和知识上优于整个欧洲进程的地方。这样,托克维尔就从某种比较社会学转到以社会学词汇提出的法国史问题方面去了。……接下来,这部著作的写作把两种解释类型区别开来: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二卷)和特殊的、较晚近的原因(第三卷)。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因果层次重叠于一种时间性差异:一般的原因是长时段的原因,埋藏在许多个历史世纪的深度里,从一个十分遥远的过去施展它们的各种效应,超出常人的记忆力,不为人知地准备着新的社会政治条件。特殊原因则仅仅在于18世纪,甚至是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它们并不反映出转型的必要性,因为转型乃漫长过程的事情,而是反映出转型的日期和性质。”<sup>[2]204-205</sup>

从具体目录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爆发进行多因性的分析,这种分析在时间上表现为由远及近,循序渐进。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托氏把大革命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社会、旧制度(旧政权)、大革命。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托克维尔试图重新把握大革命这一大历史事件的“时间性”。历史是具有“连续性”的,不是断裂存在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是被其偶然性所决定的。在此处我们可以用政治学中的“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model)来进行解释,即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种过程,在漫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到来的。也就是说,革命不是被领导的,而是一种政治过程。然而,用历史视野中的表述可能更为准确,当代法国大革命史学家傅勒试图看到托氏的意图:“法国大革命是我们过去历史的充分绽放。它圆满完成了君主政体的事业。它不仅远未构成一种断代,而且只能在历史连续性之中通过历史连续性才能得到理解。它在事件中完成了这种连续性,但在意识中它却显得像是(历史的)一个中断。”<sup>[2]24</sup>

美国历史学者小威廉·H. 休厄尔把这种“连续性”所表现出来的“时间性”称之为“目的论的时间性”——把历史视为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时间性表现<sup>[3]78</sup>。意即历史的发展不在于其偶然事件的结果。而在于不为人知的长期因果力量的结果,同时目的论的诠释指向某些未来的历史状态,即未来的事件才能真正解释现状中的事件。托克维尔在书中指出,“大革命绝对不是偶发事件。没错,它曾让全世界感到很突然,然而,那只是人们长期努力的自然结果,是十代人前赴后继所投身奋斗的事业突然而猛烈的结局。

<sup>①</sup> 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议》(第二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即使没有发生大革命，古老社会的大厦迟早也会倒塌，只不过不会瞬间崩溃，而是一砖一瓦地逐渐坍塌。大革命，是痉挛式地、直截了当地、毫无征兆地、无所顾忌地、突然迸发地，完成了需要经过点点滴滴地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功绩。”<sup>[1]19</sup> 托克维尔所要指出的是，大革命的爆发虽然一蹴而就，但却是由旧制度社会逐渐演进的结果。旧制度或者说旧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在于对传统社会的权力秩序进行重新洗牌和塑造，而大革命似乎只是一种新的更迭，即对旧王朝合法性统治的取代。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状况依旧充满着不稳定和混乱，政权的不断更迭、君主制的复辟、中央集权制的再现无不说明了这种“连续性”。

因此在历史观上看到法国大革命中的“连续性”是托克维尔的高明所在，他要打破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崇拜，还原大革命中的“普遍性”意义。正如托克维尔对历史的看法：“历史就是一座画廊，在那里真品很少，赝品很多。”<sup>[1]46</sup> 由此，托克维尔在处理法国大革命的材料时非常谨慎。在方法论上，首先他把大革命置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视野中：工业革命的到来，传统社会的衰弱以及西方社会中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在 18 世纪，欧洲旧政制几乎都已经濒临崩溃。旧政制的腐朽衰落，在欧洲随处可见。如今尚存的一切中世纪权力，都患同一疾病，都同样衰败而毫无生机。比如贵族制度的衰落，政治自由的消逝。”<sup>[1]17</sup> 其次，他并不孤独地看待法国的现象，而是运用比较研究的视野把法国社会状况的种种层面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进行横向比较。“匆匆了解一下法国以外国家的情形，是正确理解下文所不可或缺的。我敢断言，如果只限于考察研究法国，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sup>[1]18</sup> 最后，在具体材料上，则是运用大量大革命时期和旧王朝时期的第一手文献，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大事，近看不如远观。”<sup>[1]9</sup> 远观可以有两种意义，一是远观可见那时所处文献资料，对文献的思考把握更具整体性；二是，现今的社会状况变化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的痕迹和面貌，因为历史带来了现在，这正是历史的连续性所决定的。

## 二、变迁——转型期的不稳定与社会心理上的剥夺感

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影响，这种联想启发于涂尔干关于社会变迁对自杀率影响的分析。在涂尔干之前，自杀被认为是个人心理现象，但他却认为，自杀同时也是一种由社会变迁引起的社会学现象。19 世纪法国自杀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打乱了原有社会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利益格局等等，从而导致社会失范。从自杀联想到社会革命，也就不难理解社会变迁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是社会学中典型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旧制度即旧王朝的 18 世纪法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种社会变迁状态，旧王朝通过中央集权对传统社会进行一步步改造。工业革命的到来，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社会阶层状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贵族阶层的衰落，资产阶层的兴起，人口也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聚集，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托克维尔对此也有描述，例如他对 18 世纪法国农民状况的描述，“开明而富有之人纷纷离开农村……农民好像是被淘汰的失败国民……农村是一切贫穷、愚昧、粗野之人的聚居地。”<sup>[1]79-80</sup> 他对首都巴黎的描述，“法国大革命前的六十年间，巴黎工人的数量已增长两倍，而同期的巴黎总人口仅增长三分之一。”<sup>[1]52</sup> 这些都是 18 世纪法国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变迁造成了原有社会规范的混乱失序，不稳定是可以预见的，革命的到来也就不难理解。

政治稳定是一个社会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前提，问题是所有社会都将面临政治不稳定的危机。通过历史上的比较研究，人们可以发现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出现不稳定的几率比较小，而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现代化过程往往是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时期。亨廷顿对这种现象规律进行了权威解释：“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sup>[4]41</sup> 这一规律很好地诠释了托克维尔之问：“为什么革命爆发在当时社会

繁荣的法国,而不在欧洲其他国家?”——转型期、改革期的社会将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在具体解释上,亨廷顿给出的更多是基于现代社会基础上的理论阐释,他认为现代化的影响包含以下几种关系:(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2)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sup>[4]56</sup>。亨廷顿还认为,不平等与不稳定有某种联系,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现代化通过两种方式引起经济不平等,进而引起政治不平等。同时,现代化还将带来的是公职人员的腐化和城乡差距的扩大。托克维尔对大革命的描述并非是直面现场的描述,他试图通过一层层的揭露,来剥开大革命的真相。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中更早看到了这一规律,但却处理得更加谨慎些。他先是给这一命题给予了更多的条件:“对于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候。”改革期正是一个社会的转型期,这一话语的反语便是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中央政府足够“坏”,以致看起来是转“好”的改革,反而给法国带来了摧枯拉朽的社会革命。

那么为什么“坏”,法国政府的问题到底在于什么地方,从而导致了这一改革悖论?接着托克维尔便大展篇幅来指出法国中央政府问题症结所在,而对于导致这一改革悖论的革命逻辑则把笔墨更多地停留在了对当时法国人民社会心理上的状态描述。“请记住: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再由市民普选产生,也不再倾听民众呼声;无处不是由达官贵人组成,其中有些人是因其拥有显要地位而参加会议,另一些人则是由行会或者协会指派参会并听从其指令的。……自那时起,人民就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般轻信虚伪的自由,也不再关心公共事务,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sup>[1]34</sup>从这里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政治参与在降低,政治冷漠在到处蔓延,而这源于政府中央集权制下对政治自由的封杀。社会心理学派认为,人们是否投入叛乱取决于人们对心理价值期望值(value expectations)和社会实际价值实现能力(value capability)之间差距的理解,即人们对想得到和能得到之间差距的认识。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就越容易造反,这个过程被称为“挫折-反抗机制”。格尔定义了三种类型的相对剥夺感,即递减型、欲望型和发展型。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则属于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即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价值能力期望均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而有所跌落,从而产生两者的落差扩大,该现象常见于发展中的或处于改革的社会<sup>[5]80</sup>。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四章“旧王朝最繁荣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何以加速大革命的到来”中,托克维尔对相对剥夺的上升带来的革命这一社会心理学派理论做了最好的诠释。“法国社会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但是,人心却躁动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仇恨一切旧制度的情绪在加剧,国家明显在走向革命。……革命的发生,并非都是由于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常见的情形是,仿佛毫无怨言、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忍受统治的人民,一旦所承受的制度压力减弱,就会猛然爆发而摆脱原有的制度。”<sup>[1]108</sup>一方面路易十六治下法国社会在看似走向繁荣,但是制度压力的减轻反而带来了人们心理价值期望的上升。但是,另一方面,“已解除的一切弊端,似乎都会让人自动联想到尚未解除的其他弊端,从而导致人们的情绪更为激烈。事实上,痛苦减轻后,感情却会更为敏锐。……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除上述一般原因外,还存在同样有力但更为特殊的原因。财政机构虽然已经如其他部门一样进行了改革,但是,仍然存在专制政府固有的弊端。”<sup>[1]109</sup>旧王朝的根本弊端依然存在,而一旦改革,带来的便是开支增加,但国库收入并未同步增长,这就导致国王四处借债,引发财政危机。而人们根本不会对这种危机产生同情,反而会对政府的表现更加失望,这种落差就成就了相对剥夺感的增加,人民更加敏感与愤怒。“一方面有一个民族,发财致富的欲望天天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有一个政府,不断刺激这种欲望,又不断从中作梗,燃起他们的希望后又让他们失望。就这样,在这两方面力量的作用下,法兰西走向灭亡。”<sup>[1]110</sup>

### 三、结构——大革命中的国家与社会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运用的国家和社会分析方法，往往被认为是国家与社会理论的鼻祖，而斯考切波则是托克维尔此种理论的最大拥趸。“为了采用这种非个人性的、非主观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就需要从一种在一般意义上被称作是关于社会历史现实的结构视角出来来研究。这种视角是分析社会革命所必需的。”<sup>[6]19</sup>斯考切波认为，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中，必须把国家当成一个独立的结构来看待。托克维尔在书中把传统法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分为三层：国家、贵族和个人。而贵族作为这三层结构关系中的中间层是最为重要的，是联系和稳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然而中央政府在改变传统社会，集中国家权力，即中央集权化后，贵族失去了统治权力，而原来底层的社会阶层在权力真空和中央集权的双重压力下，变得分裂，呈现原子化特征，因而失序混乱极易爆发社会革命。

在国家结构层面表现为中央集权制特征。“对于一切事务，它都有最终决定权；一切指令的，都是从这里发出的。但是，御前会议并不享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管辖权；一切决定，尽管都是由御前会议发布的，但全都是国王的决定。”<sup>[1]29</sup>“由于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因此，他也摆脱了旧义务。但是，又没有任何地方政权、议会、省或者教区机构取代其位置。任何人都不再负有照顾乡村穷人的法律义务，唯有中央政府勇敢地承担起救济穷人的工作。……当时的政府倘若能够减轻农业负担，减缓不平等状况，效果还会更好，但是，它显然从未想到这一点。……御前会议有时会强迫人们发家致富，而不管人们是否具有这种愿望。……由此可见，当时的政府已由统治者角色转变为监护人角色。”<sup>[1]32</sup>托克维尔在这里提到了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央集权制。这一制度在权力秩序在顺序安排上从上至下表现为：国王—总监—御前会议—省督—省督代理人。作为贵族的领主显然被排斥在权力秩序之外。这种中央集权所表现的权力似乎“统治”着所有：金钱方面征税权被政府所持，牢牢控制自卫队、公共工程、各省治安、穷人救济以及人们的发家致富，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全能（无限）政府。托克维尔也更具讽刺地提到，政府已不再是原来的“统治者”角色，而是代替了“领主”所持的“监护人”角色，而监护就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关于中央集权的弊端，一方面，当政府的义务或责任没有好好肩负起时，即政绩不好时，民愤就要对准政府，危机也要来临；另一方面，中央集权制带走了人民的政治自由，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参与的下降，政治冷漠现象到处都是。这也在后来导致人民缺乏参政经验，缺少议政能力，以致后来文人空有政治热情却毫无政治经验，人民很容易在意识形态或者社会舆论领域被操控。与此同时，中央集权制还破坏了法国传统社会的司法独立性，加剧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使一切社会资源聚集在首都巴黎，危机一触即发。

在社会结构层面表现为阶层分裂的特征。贵族阶层与资产阶层的对立，“在法国，与创造‘贵族绅士’这个词的时代相比，世袭贵族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分离更加严重，而且其发展呈现出不同于英国的反向运动。……倘若资产阶级与贵族阶层已变得更相似的话，他们同时也会变得彼此分隔得更远。这两个阶层是无法融合在一起的，两者的相似只能让双方疏离而不能让双方亲近。”<sup>[1]57</sup>资产阶级与农民阶层分离对立。“由于居住地不同，更主要是由于生活方式不同，最主要是由于利益不同，资产阶级与农民阶层相分离。……有无数官职可以让资产阶级免除税赋等负担。……这些可悲的特权，使那些被剥夺特权之人羡慕妒忌，使那些享有特权之人自私自傲。在整个18世纪，没有什么比城市资产者与郊区农民之间的彼此敌视与妒忌更为显见之事。”社会贫富差距在扩大，社会分化对立十分严重。“捐税的不平等导致各阶层的分离，使人们彼此之间孤立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自那时起，最有能力纳

税之人得以免税,最无能之人却得纳税,于是就出现一种怪异的局面:富人免税,穷人交税。”<sup>[1]66</sup>城市下层阶层陷入无政府状态。“行会理事会的破坏及其后不完全的部分恢复,深刻改变了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新建立的关系,不仅不同以往,而且不稳定、不自然。教会权威已被摧毁,政府提供的保护不稳定、不可靠,因此,在政府与雇主之间,手工业者处于尴尬而不明确的地位,不知道他们谁能保护自己或者谁应该收留自己。整个城市下层阶级骤然落入茫然无措的无政府状态,一旦人民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就会产生严重后果。”<sup>[1]118</sup>其结果便会“导致社会各阶层互相排斥而无法达成共识,更无法形成共同反抗的局势。其结果是,政府任何时候要对付的只是寥寥数人,从而完全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社会的分化,下层阶层的无政府状态原子化,上层阶层的对抗成为各自为政的小团体变得孤立弱势,社会由此失控。

而在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间组织上呈现权力真空状态。缺乏具备效力的政治组织,“没有议会,没有报纸可以监督制衡政府官员专横跋扈、胡作非为与喜怒无常的行为。”<sup>[1]46</sup>缺少中层组织,权力真空出现。“中央政府已经完全取消了所有中间层级代理机构,在中央政府与个人之间只是一片空白。因此,在人们眼中,中央政府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唯一而必不可少的代理人。”<sup>[1]47</sup>作为中间层级代理人的贵族在失去统治权的同时换来了更多不公平的特权。“作为集体的贵族阶层在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作为个人的贵族,却获得了许多以前未曾拥有的特权,或者比以往拥有更大的特权。”<sup>[1]58</sup>

#### 四、话语——大革命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

话语权的争夺在世界革命斗争史上从来都不缺乏市场和声音。“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sup>[7]37</sup>马克思非常强调工人作为无产者从自发到自觉成为阶级进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一过程中意识的重要性。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这种话语权之重要性的最好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直接指出,西方革命的核心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sup>[8]74</sup>。社会运动的话语是内嵌于文化之中的,并且,许多社会运动的话语过程都是围绕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展开的<sup>[5]26</sup>。

##### (一)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所谓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就是指政权取得合法性的依据或者说来源,大部分学者认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有三种:理念基础、规则基础、有效性基础。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即认为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是其意识形态。政治合法性的规则基础,即认为国家合法性的依据是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对已有的规则的遵循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合法性的原初含义就认为权力应遵循法律。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即认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是政治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程度,也称之为政府政绩<sup>[9]174-177</sup>。

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立起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框架来对托克维尔笔下的旧制度和大革命进行范式分析。首先,在政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上,作为传统社会过渡期的法国旧王朝,其政治权力的辩护人依旧是上帝。“世俗君王的权力得到加强,而教会权势则随之削弱。教会一度凌驾王权之上,后来与王权平起平坐,最后则沦为王权的庇护对象;君主与教会已达成交易:教会向君主提供精神力量,君主向教会提供物质力量;君主令臣民信守教会教规,教会则让信徒服从君主意志。”<sup>[1]96</sup>其次,在政治合法性的规则基础上,旧王朝毋庸置疑要依靠法律。“在那个时代,确保人们听到被压迫者呼声的唯一途径,就是司法机构。那时的法国,就其政治、行政制度而言是专制国家,但是,就其司法制度而言,仍然是自由的国度。……那时的法官,不但终身任职,而且并不追求升官发财,这两点对于保持独立很关键,其道理在于:无法革职,如何收买?”<sup>[1]75</sup>最后,在政治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上,则是旧王朝利用中央集权为人民包办一切,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

## （二）政治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意味着政府的信任危机和权威危机。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政治体系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大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加以消解，容易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甚至政治体系的崩溃<sup>[9]179</sup>。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则直接说明了法国旧王朝没能处理好自己的合法性危机，从而导致了政治体系的崩溃。而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和变化则取决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构成。政权如何面对合法性危机，一则考验其政体的效力，二则如何面对新崛起的合法性势力对政治合法性的争夺。

从理念基础上来看，原来作为提供合法性支持的君权神授理念随着教会的衰落而逐步衰亡，“人们狂热不休地想从灵魂深处铲除其信仰，结果却造成灵魂空空荡荡而无所寄托。”<sup>[1]94</sup>“此外，当时的教会本身就是首要的政治团体，而且是最令人厌恶的政治团体，尽管并非具有压迫性的政治团体。其原因在于：教会已卷入政治圈，尽管这是背离其本性和使命的；教会谴责别处的罪恶，却让政治权力中的罪恶神圣化，并利用其神圣不可侵犯性掩护罪恶，似乎是欲使政治权力像教会一样万岁。”<sup>[1]95</sup>而宗教信仰的出走，以及精神世界的另一领袖贵族阶层的衰落，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一时空虚，文人们则乘虚而入，“每个人都认为，应该用建立在自然理性法基础上的根本的而简单的法则，取代规范他们所处社会的传统而复杂的习惯法。……就这样，公众激情披上了哲学外衣，政治生活裹上了强烈的文学色彩，文人引导着舆论并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据的位置。……全盛时期的贵族阶层，不仅主导政务，而且还主导舆论，给人们的创作定基调，给人们的思想定条条框框。到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方面的权力，其信誉与随之丧失。曾被贵族占领的精神领域成为真空后，文人们得以轻松传播其思想并独占贵族以前的阵地。”<sup>[1]88-90</sup>

在18世纪的欧洲，政治理论的中心从英国转到了法国。“专制政府的衰落，使得法国哲学再一次转向了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从1750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的这段时间里，对这个论题的讨论也变成了一种时尚。文学的每一个分支——诗歌、戏剧和小说——都成了社会讨论的一个工具。”同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的资产阶级就提出了以“人民主权”学说为基础的诸如“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将这种意识形态观念加以概括并灌输于社会，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社会成员中取得一致化的意识形态<sup>[9]174</sup>。在此处就不得不提及被托克维尔故意遗忘的卢梭了。“不能否认作家的影响，尤其是卢梭，他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公益（general will）是政治共同体至高无上的主权权威……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很热销，虽然卢梭并不是作为社会基础的契约观念的创造者，但是当人们在讨论莫普针对专制主义的改革尝试的政治意义的时候，最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思想的正是卢梭对社会契约观念的阐释。”<sup>[11]99-100</sup>启蒙运动为法国革命做好了意识形态的准备，其中的知识分子成为话语权的领导者。权力的空缺意味着人民就是政权，话语取代权力成为惟一的保障。“从这个时候起，合法性（和胜利）属于那些象征性地代表人民意志并成功地统辖人民机构的人们。用一个抽象的等价物体系去取代选民代表制，乃是直接民主不可避免的悖论；只有借助它，人民意志才能不断地与权力重合，而行动也非常恰当地合于它的合法性原则。……大革命用争取合法性的话语竞争来取代权力的礼仪之争。革命的领导者们从事的是不同于行动的“职业”；他们是行动的解释者。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一整套新的做法，它给政治注入了超额的象征意义。”<sup>[2]73-74</sup>

从规则基础上看，司法独立性被破坏，普通法院被特殊法院所架空。而人们也失去了对法律条文遵守的耐心，代替内心法治原则的则是“法外开恩”现象屡禁不止背后的欲望。“旧王朝的司法权，一方面不断超越其应有的职权范围；另一方面又从未全面履行其职权。……行政越权与司法越权都很危险，但是，行政越权更危险，因为司法干预行政损害的只是程序问题，而行政干预司法使人们堕落，使人们变得一面是奴性，另一面是革命性。”<sup>[1]40</sup>“每个人都认为，应该用建立在自然理性法基础上的根本的而简单

的法则,取代规范他们所处社会的传统而复杂的习惯法。”<sup>[1]88</sup>“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权利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是,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刑事法庭在审理涉及老百姓的案件时的某些司法行为。……当穷人和国家打交道时,诚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他们遭遇的是特别法庭、充满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伪的的审理,以及不得上诉而先予执行的判决。”<sup>[1]116</sup>

从有效性上看,利普塞特对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关系上这样论述:“一般来说,即使一种政治制度具有合理的有效性,如果在任何时候主要保守群体的地位受到威胁,或在关键时期新兴群体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机会,该制度的合法性仍将成为问题。另一方面,一再地或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也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sup>[12]</sup>在政治参与影响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关系问题上,亨廷顿也持类似看法:“改革的合法性取决于君主的权威。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从长远来看,却必须以社会上各种集团的参与为基础。”<sup>[4]163</sup>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旧王朝虽然看似社会繁荣,政府政绩带来的有效性较高,但实质上中央集权化对政治自由的剥夺造成了社会政治参与的降低,使得一旦有效性有所不足就会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这在侧面说明了法国旧王朝制度的有效性不稳定,且危机四伏。而原来作为中间层力量的贵族在其权力合法性被取代后,这种有效性就更难以保障,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层和人民。“人们在封建时代看待贵族,犹如我们在今天看待政府一般:为得到贵族给予的保护,就得接受贵族施加的负担。虽然贵族享有令人感到痛苦的特权以及有权施加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但是,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平正义,执行法律,扶弱济贫,管理公共事务,就是其天然职责。当贵族不再负责上述事情时,贵族特权带来的负担就会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是否必要也是问题。”<sup>[1]26</sup>

## 五、思考与启示

对于此书,傅勒很有先见之明:“这本书始终是这一史学的可怜的长辈,引用的人多,读它的人少;涉猎的人多,读懂的人少。”确实,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给后世带来的是无限的思考。难以真正理解的并不只是书本描述的表征,更有托克维尔内心深处的隐微写作和托克维尔的价值立场。傅勒认为,“法国思想基本上忽略了求助于利益最终一致和特殊冲突的共同功用这类概念;即便它被搬移到经济上,甚而搬移到一种自由经济上,如重农主义的情形,它也需要把社会体现为一幅统一的图景,而这正是合法专制主义的理性权威。这是因为,它不停地围绕着一种社会政治视野兜圈子,不停地提出起源及社会契约的合法性问题。如果仅仅是所有人赞同便缔造了权力和法律,那么,社会又是什么呢?如何才能思考处在国家中的自由的个人,同时又思考个人的自由在国家里的异化?”<sup>[2]46</sup>这些拷问或许正是托克维尔当初深厚的思考。我们也可以细微观察到托克维尔对法兰西民族劣根性的嗤之以鼻,对法兰西精神的嘲讽;对革命意识形态的虚无所进行的批判,对集权制度的痛恨;同时对个人权利的真正追求;以及对自由的真正追求和无限热爱。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在走向更自由的市场经济,快速的城市化重新塑造了中国的社会阶层,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也日趋多元化。中国的繁荣不比法国的繁荣缺少喧嚣。然而在整个社会拥有巨大向前进发的动力时,政府的“转身”似乎慢了许多,全能政府还在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型,社会管理还在适应“社会治理”的变化,“依法治国”还未真正成型。一如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带来的警示,中国社会也在遭受着社会转型变迁、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政治合法性的话语危机。经济改革走在前头,然而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滞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社会,一旦上层建筑滞后就需要革新。王岐山同志在推荐这本书时,所警惕的正是法国大革命所告诫的:“对于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候。”中

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依法治国的深化。法治中国建设的出现与强调，对于转型期中国的社会治理而言是一剂强心剂，无论对于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还是人民群众而言都是一种必要的价值规范。面对转型期的社会失范，以良好的法制去约束个体、集体以至国家这个巨大的共同体的行为，能有效降低社会失控的风险，使改革能够有效稳步推进，释放更大的改革红利。

#### 参考文献：

- [1] (法)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 [M]. 钟书峰, 译.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
- [2] (法) 弗朗索瓦·傅勒. 思考法国大革命 [M]. 孟明,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5.
- [3] (美) 小威廉 H 休厄尔. 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M]. 珠联璧,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78.
- [4]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M]. 李盛平, 杨玉生,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5]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M]. 2 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6] (美) 西达·斯考切波. 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 [M]. 何俊志, 王学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19.
- [7]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37.
- [8] 衣俊卿.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74.
- [9] 燕继荣. 发展政治学: 政治发展研究的概念与理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10] (美) 乔治·萨拜因. 政治学说史: 下卷 [M]. 邓正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11] (英) 威廉·多伊尔.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M]. 张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99-100.
- [12] (美) 利普塞特. 政治人: 政治的社会基础 [M]. 刘刚敏, 聂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56.

## French Revolution: Change, Structure and Discourse

### —Taking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as Center

Hu Yangyi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ocqueville's eyes, we should take a stand of "timeliness" on the "continuity" to understand Tocqueville's reform paradox; and to deconstruct his reform paradox, we can use the basic perspective in the social movements research: Change-Structure-Discourse. Social changes in the French society is in the instable transitional period, once the government's effectiveness declines, o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will trigger a revolution; as for social structure, because of the centralism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he social class division at the social level and lacking the middle link between nation and society, it makes the society lose the control of revolution easily; at the discourse level, it shows the legitimacy crisis in politic. The literati with little political experiences controlled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the power vacuum and their discourse helps to stir the outbreak of the revolution. The transi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re facing similar social status as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of China to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provides a value standard, reduce the risk of social control.

**Key words:** nation and society; social movements;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收稿日期: 2016-02-28; 责任编辑: 朱世龙)